



点点光年

星光点点

——新疆革命斗争故事

谢刚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星光点点

谢刚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3印张1插页50千字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00

统一书号: 3098·218 定价: 0.22元

目 录

铮铮铁汉…………… (1)

再见吧，母校
在滚滚的急流中
战士生涯
呕心沥血为中华

人民的好战士…………… (23)

永不停息的追求
战士的心愿

风云初起…………… (33)

“三·一九”枪声
迷朦的烟雾
在神秘的天主教堂里

秘密通讯网…………… (52)

一定要找到党代表
留取丹心照汗青
打不断的钢铁纽带

星光点点…………… (72)

工犯尼牙孜

沉默寡言的马看守

年轻的少尉

“你们背后的一群年轻人”

铮铮铁汉

一九四五年七月，在塞外边城迪化监狱的一间阴暗、潮湿的养病室里，中华民族忠实的儿子、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乔国桢同志溘然病逝。逝世之前，他曾给我党在狱中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内称：“我在病中正深刻自省，一生虽无愧于党和人民，但大部分时间消磨在反动派狱中，不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深为遗憾。深望牢内全体同志团结一致，坚持对敌斗争。”乔国桢同志十七岁入党，曾在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尔后的二十余年间，又在陕西、北京、天津、唐山等地从事农民、工人运动，担任过中共陕甘区委农民运动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等职。他先后六次被反动派逮捕入狱，由于长期艰苦的斗争生活与狱中磨难，严重地摧残了烈士的健康，未能亲自迎接红旗如海、欢声雷动的革命胜利的节日，年仅四十岁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

坎里，永远激励后来人踏着 he 走过的路胜利前进！

在十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曾无中生有地给烈士捏造了许多罪名，但鸦群的羽翼怎能永远遮蔽太阳的光辉呢！乔国桢同志是属于党、属于人民的。党和人民将永远记住乔国桢这个光辉的名字！

再见吧，母校

这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清晨，寒风拍打着枯树的枝条，席卷着地上的败叶。陕西省绥德小城，在穿着长袍、马褂与粗布棉袄的熙来攘往的人群中，有一个穿着破衣烂衫，脖子上围着一条白毛巾的年轻小伙子。这就是正在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三班读书的乔国桢。昨天星期日，他穿着一身穷苦工人的服装，和几个进步同学，深入矿区，上午与工人一起劳动，下午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他讲述苏联十月革命的故事，鼓动工人起来与资本家斗争。现在，他正与一位同学一起向学校匆匆赶去。

一进校门，同班的一个小个子同学向他迎来：

“国桢，不好了，昨天咱们去矿区宣传的事，王榆林知道了！”

“哦——”

“王榆林说，非治一治我们不可。还说，今天要

进行算术考试！”

小个子同学所说的王榆林，是第四师范第三班的算术教员。此人，是陕北榆林人，思想极其反动，且与当地军阀过从甚密，并仗势经常体罚学生，与进步师生作对。今天，应该怎样对付他们的刁难呢？乔国桢沉思着，向教室走去。

教室里，有的学生正临时抱佛脚，急急忙忙地翻书复习；有的正气鼓鼓地破口大骂王榆林。乔国桢一进教室，便被围在中间：“乔国桢，怎么办？”

乔国桢在班上能团结同学，威信很高。他学业出众，各门功课考试常是名列第一。他的父亲乔兴斌是前清秀才，对他管教甚严，使他自幼博学多识，才华出众，又兼他学过拳术，常保护幼弱的同学不受欺侮，因此，在班上很受信赖。一九二四年他考入省立第四师范后，在国文教员王懋廷和二班同学杜嗣光两位共产党员的帮助下，积极学习马列主义，参加革命活动，后经他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刻，大家都盼望他拿出主意。

还没等乔国桢开口，一个同学就嚷嚷起来了：“罢考！咱们就象工人罢工那样，给他来个罢考！”有的同学也随声附和。

对于学习，乔国桢一贯非常认真。他觉得要改造

落后的中国，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努力学好文化知识。可是今天，王榆林却是在借考试来刁难进步同学的革命活动。是应该顶一顶这个老顽固啦！可是，他又觉得公开拒绝考试，不利于团结更多的同学。所以，便建议用交白卷的方法，软顶！

上算术课了。王榆林果然出了一些刁钻古怪的考题，妄图以此降服这些不易管教的学生。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学生竟面无难色，有的还挤眉弄眼，偷偷发笑。

乔国桢把题目看了一遍，哼！王榆林尽管在命题上绕了些弯子，但竟没有一道能难住乔国桢的。倘若不是与同学有约在先，他定然可以再用一次满分去回敬王榆林的挑战。现在，他只是在试卷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之后，第一个交了白卷。

看着乔国桢的白卷，王榆林瞠目结舌。接着，又有几张白卷交到了他手中。继而，全班同学或答一、二题，或答三、四题，便陆续交了卷。王榆林发现自己被捉弄了。他老羞成怒，想整治一下乔国桢，杀鸡给猴看，于是捧着一堆白卷，气急败坏地向校长室走去。

王榆林倚仗军阀的势力，以辞职要挟校方，不达处罚乔国桢的目的不肯罢休。尽管一些正直的教师与老校长不愿意处罚乔国桢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但

乔国桢却无法在那个鬼狐横行的学校继续逗留下去了。

临别之际，王懋廷同志赠给他二十几元川资，其他师生或主动为他准备干粮，或送来书籍、礼品留作纪念。他们舍不得乔国桢远离而去。

乔国桢也舍不得离开学校、离开老师和同学们。在过去的一年多里，在这里，他接触了大量马列主义读物，懂得了许许多多的革命道理。在这里，他找到了党，找到了一条通向光明与胜利的正确道路。

在滚滚的急流中

离开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不久，受党组织委派，乔国桢经上海辗转来到广州，在毛泽东同志主持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这里，他聆听了毛泽东同志亲自讲授的《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等课程，听取了周恩来同志讲授的《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以及肖楚女、彭湃、恽代英等同志的授课。参加这届农讲所学习的三百多名学员，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有一定斗争实践，勇于为革命献身的青年志士。在这里，乔国桢同志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关于农民运动的学说，也坚定了他投身于工农革命运动的壮志。

乔国桢，自幼生活在陕西葭县乔家寨农村。父亲虽是读书人，却长期在农村耕地、教书。从少年时期，乔国桢就直接感受到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日益破产，给广大农民所造成的贫困与灾难。国民革命需要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广大农民也只有起来革命才能改变他们的悲惨处境。在农讲所，乔国桢更加认识到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基本问题，他十分敬佩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农村现状的深刻了解和分析。

一九二六年夏秋之交，乔国桢又回到了陕西。党派他去三原及西安附近各县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他担任中共陕甘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他亲自向农民讲述革命道理，培训农民骨干。他亲自主持农民斗争土豪恶霸的大会，并在斗争中随时注意到引导农民群众认识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重要意义。在三原县五区，他创建了区农民协会，亲自担任区农协主席，而且在区以下组建了五个分会，每个分会有五人负责，共辖三十八村，每村设委员三人，负责宣传、组织及农民武装等工作。就这样，长期从事个体劳动的陕西农民，第一次有了可以与地主、豪绅及反革命武装相抗衡的自己的组织，大大推动了陕西省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进展。作为农民运动的组织者

与领导者，乔国桢同志经常四处奔波，废寝忘食，有时一天要走上百里的路，却顾不上吃一顿安稳饭。他深受农民的拥戴，农民尊称他为“乔先生”，把他看作可以信赖的知心人。

一九二七年春，北伐战争的胜利，大大推动了陕西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在我党的领导下，在古城西安召开了第一届陕西省农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了陕西省农民协会。乔国桢同志亲自率领多达十万以上的农民，肩扛红缨枪与各种农具，在西安街头游行。“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剥削！”“打倒军阀！”的吼声，久久回荡在古老、威严的长安城上空。组织起来的农民的威力，极大地震慑了陕西军政各界。年轻的乔国桢则成了深为社会各种势力瞩目的农民运动的领袖之一。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冯玉祥，曾十分惊讶地说：“人们说我的兵多，我的兵与乔先生领导的农民队伍相比实在是少得多啊！倘若乔先生领导的农民全部集合起来，我的兵不到他的万分之一，真是望尘莫及呀！”分散落后的农民群众，一旦组织起来，就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长期以来，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的地主、恶霸、军阀、官吏的嚣张气焰被打下去了，西安市成了西北地区革命的中心。

但是，革命事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买办资产阶级的勾结，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关键时刻退出革命阵营和中国无产阶级的不成熟，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导致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公然发动反革命政变。五月，湖北夏斗寅与湖南许克祥叛变。被反革命势力所动摇的冯玉祥也提出了所谓调解宁汉纠纷，六月十日并与武汉政府汪精卫等在郑州密谋公开反共。接着十九日又与蒋介石在徐州开会，决定“清党反共”，“宁汉合作”，蒋、汪联合反共反革命。七月中旬以后，曾一度受到打击的地主、豪绅，在其反革命武装的支撑下，又在陕西城乡向农民、工人反扑过来。许多地方的农民协会被强迫解散，反革命的血腥镇压，使革命又一次陷入低潮。

面临严重的挫折与失败，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乔国桢同志没有动摇，没有犹豫，也没有离开他的战斗岗位。他始终在斗争的第一线，经受着血雨腥风严峻考验。

“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打响了。在遥远的陕西农村，乔国桢与他的伙伴们深受鼓舞。特别是在党的“八·七”紧急会议召开以后，乔国桢等同志遵照党

的指示，积极组织农民群众，迎着白色恐怖，在三原等地农村，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攻。一九二八年春，乔国桢同志领导三原数万农民，包围了国民党三原县政府大院，抗击反革命政权的苛捐杂税与残酷镇压，打破了当时农村在反革命高压下的沉寂局面，鼓舞了渴望翻身与解放的陕西农民。

一九二八年夏，著名的陕西“渭南暴动”爆发了。作为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乔国桢同志，积极地投入了这场为建立农民革命武装、革命政权的激烈斗争。四月二十七日，他与陕西革命斗争的主要领导人刘志丹一起出席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成立大会，教育并引导广大农民走上以革命的武装摧毁反革命政权的正确道路。他积极组织渭南、华县以及附近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地区的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烧地契，分粮食，摧毁渭南、华县各级反动政权，打垮军阀与地主团防的武装势力，并在各村庄组织农民自卫队和苏维埃政权，点燃了农民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

反革命武装镇压开始了。敌人调动了大批军队向渭南、华县革命群众反扑过来了。敌人所到之处，就放火烧村。眼看着群众被驱赶、被屠杀，乔国桢同志义愤满腔。哪里有困难，他就到哪里去；哪里危险，他就在哪里出现。为了保卫革命政权，他积极组

织四乡农民拿起刀枪、长矛，以及各种农具，配合西北工农红军勇敢反抗，打垮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在那浴血斗争的日子里，年轻的乔国桢同志始终和武装的农民战斗在一起。

由于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渭华暴动”失败了，乔国桢等同志被捕入狱。后经党和人民的救援，方才获释。

严酷的斗争实践，使乔国桢同志深刻地认识到，要彻底改造旧中国，要使人民摆脱被压榨的地位，必须进一步广泛发动群众，必须用枪杆子进行斗争。

“渭华暴动”失败了，但是革命的巨流是不可阻挡的。“渭华暴动”在陕西农民心上播下的火种，是必然要重新燃烧起来的。

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在出狱后，乔国桢同志离开了陕西，被派往北方局工作。在时代斗争的滚滚激流中，乔国桢奔向一个新的战场。

战 士 生 涯

秋日的清晨，天空灰蒙蒙的，沉沉乌云紧压着低矮的房檐，一片萧索景象。一辆破旧的黄包车摇摇晃晃地碾轧着残枝败叶，在天津市东关区坑洼不平的小街缓缓地移动着，最后，在失业女工小周家门前停了

下来。乘坐在车上的是一位身体瘦弱、面容憔悴的读书人模样的先生。他的腿有点瘸，行走不方便，在车夫的搀扶下，才走进了屋子。

听见门响，小周放下手中的活计，惊异地打量着面前突然出现的陌生人：“先生，你找谁？走错了门吧！”

客人努力站稳了身子，才开口问道：“你姓周吧？”

“是呀。你找我家？”小周仍有点纳闷。

“唔。大姐，是你家里的人托我来看望你的。”

噢，家里人！小周明白了，是地下党组织派来的同志。她一面端水让坐，一面打量着对方。他面色苍白憔悴，须发挺长，但从炯炯的双目中仍透出一种英俊、刚毅的神色。这是一个年纪不过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啊！小周从以往接触的地下党的同志身上得知，党是为贫苦工人谋福利的组织。面前的这位客人跛着腿，行走那么艰难，却仍在为穷人的事业而奔波着，因而立即赢得了小周发自内心的尊敬。

客人取出了地下党组织写给小周的信件，作了自我介绍，并询问小周：“愿不愿意去纺纱厂当工人”？

“愿意，愿意！”小周十分激动。面前这位素昧生平的先生，竟抱病为安排她这样一个普通女工的工作而奔波……她情不自禁地瞅瞅客人那条行动不便的

腿，“谢谢你，先生，谢谢……”

“不，不要感谢我，是组织上让我来的。”客人摆摆手让小周坐下。然后，又介绍了纺纱厂的情况，交代了进纺纱厂做工要办的手续。

客人要走了，小周送出门外。望着他那一拐一拐的渐渐远去的身影，她久久凝目沉思。多么坚强的同志啊！小周感到一种勇气和力量。

这位客人，就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西农民运动的著名领导人之一乔国桢同志。那青年女工小周，就是后来乔国桢同志的妻子周铁忠。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乔国桢在“渭华暴动”失败被捕获释之后，又被党组织派到北方局担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在晋冀鲁豫地区开展工人运动。他曾亲自组织、领导三万多名人力车工人开展反对军阀买办、资本家的斗争，並曾亲赴唐山开滦煤矿，深入矿井，走家串户，领导数万煤矿工人多次罢工，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买办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压榨与剥削。他住过人力车工人的贫民窟，他吃过煤矿工人的窝窝头，他常常四处奔波，甚至有一天连一顿饭也吃不上。由于长期生活在艰苦斗争环境中，再加上他两次被捕，在狱中遭受百般折磨，使他骨瘦如柴，两颊塌陷。但长期斗争也锤炼了他刚毅